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文库

第一辑

和 磊◎著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GRAMSCI AND CULTURAL STUDIES



NLIC 29706933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文库

第一辑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GRAMSCI AND CULTURAL STUDIES

和磊◎著



NLIC 297069339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和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04 - 9417 - 1

I. ①葛… II. ①和… III. ①葛兰西, A. (1891—1937)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903 号

责任编辑 史慕鸿
责任校对 周 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 × 960 1/16

印 张 21.2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序 言

和磊即将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作为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和磊的论文是研究葛兰西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的，或者说，文化研究是如何利用葛兰西的理论资源而得到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甫一诞生，便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迅速由英国延伸至世界各地，成为一种国际学术思潮。文化研究有着多样、复杂的知识谱系和发展路径，因此要对文化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阐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有几个关键的转折和核心人物是梳理其发展演变脉络时无法绕开的，其中就包括葛兰西。

葛兰西虽然是一个政治家、革命家，但也是杰出的理论家。他的文化领导权（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the Turn to Gramsci，翻译为“转向葛兰西”更准确）。因此，选取葛兰西作为进入文化研究的一个切口，是适宜的。以葛兰西为轴心，把转向前和转向后接通，并探究其内在变化理路，不失为进入文化研究堂奥的一个极佳选择。

葛兰西带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他对权力的理解。他从一种单向压制式的权力观，转向一种双向谈判式的权力观，这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权力形态与统治方式，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权力与统治，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权力观是葛兰西深入细致地考察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发现。

葛兰西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两部分。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在葛兰西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化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简单使用暴力和强制，而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赢得其在文化、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人民接受他们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核心问题，是你的“领导”能否被大众自愿接受，能否赢得合法化的问题，也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能否达成“共识”。这就点出了文化领导权的实质。统治阶级在赢得大众同意过程中，充满着双方的谈判，以及谈判中的让步、妥协或折中平衡，最终达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方案。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领导也就获得了其合法性。围绕着领导权，葛兰西还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比如常识、健全的见识、有机知识分子、历史集团、阵地战，等等，这些概念都对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在这本书第一章对这些概念给予了清晰的阐释。

事实上，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许多学者〔如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借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的场所。这样，既扬弃了那种把大众文化看作麻醉剂，看作腐蚀愚弄大众的工具的观点（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也摒弃了盲目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以文化民粹主义为代表），使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更为全面和丰富。此外，在媒介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研究、知识分子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方面，都有葛兰西的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身影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几乎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本书对此进行了尽可能周全的介绍和评述。

在理论的梳理与结构的安排上，本书以历史为线索来组织，在详细阐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英国文化主义、伯明翰学派、斯图亚特·霍尔、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费斯克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派别或代表性人物与葛兰西的密切关系，阐述了它们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运用与挪用，以及由此而对文化研究发展的推动。也正由此，本书特别重视理论发展的历时性线索，在阐述本书所涉及的看似散乱的理论家、理论派别中，力求准确把握其承继性与变异性，为我们理解葛兰西理论的再阐发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较为清楚的线索。我们看到，从最初的英国文化主义到当代的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乃至后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在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中基本上走了一条由阶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到话语（后现代主义理论）、由话语到文化政策、由革命到日常生活、由历史集团到零散的个体、由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甚至由霸权到后霸权的道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相互碰撞与交织，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理清了这些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除了在整体上强调理论发展的历史性之外，在每一部分的阐述中，作者都注重对当时理论语境的详细梳理，这对我们理解理论的演进与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而语境化正是文化研究的特色所在。比如第二章在阐述文化研究的兴起时，作者全面分析了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尤其分析了英国传统的文化主义的顽固与不足，这就使我们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文化研究为什么会极力寻求其他的理论支持。在对伯明翰学派的阐述中，作者详细阐述伯明翰学派接受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过程，并指出伯明翰学派接受葛兰西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接受葛兰西的过程

中融合进了结构主义理论，从而使其对葛兰西理论的运用显得与众不同。其他文化研究的分支对葛兰西的接受同样如此。比如，后马克思主义在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时结合了话语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更多地借鉴了福柯的权力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理论。这样的分析对我们理解理论杂交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任何理论并不具有所谓的纯粹性，往往会渗透着其他的理论，因此分析与辨析理论的融合和变异，对我们理解理论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其他理论的不断融合中，文化研究才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遭到了质疑，尤其是随着世界全球化的推进以及新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人们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尤其是其宏观革命倾向，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挑战，转而提出“后霸权”概念，以此来阐释当今世界的权力变化。本书在结论部分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不过本书也认为，后霸权虽然在当今社会有着突出的表现，但霸权在当今世界同样存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并未过时。

总体上看，本书通过梳理文化研究对葛兰西的接受史，对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富有创建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本书所运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第一手材料，涉及数量庞大的文化研究论著，这样的治学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当然，由于论题的范围和难度，本书不可能对葛兰西与文化研究这个论域的所有方面都进行深入全面的阐释，比如关于葛兰西与后现代主义、关于后霸权等问题。和磊自己说他还要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前行，我相信以后他会对这些更有更为详细精彩的阐释。

在结束本篇序言之际，我要说几句学术之外的话。通过几年的师生交往，我深感和磊是一个正直憨厚、痴迷学术的人，多年来他心无旁骛，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在地做学问，从来不投机取

巧、哗众取宠。我和他师生情谊甚笃，并多次合作，每次都十分愉快。

最后，我要献上我深深的祝福，为他的学术前程，为他的美好生活。

陶东风

2010年11月12日于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绪论	“葛兰西产业”与文化研究	(1)
一	葛兰西及其理论简述	(2)
二	“葛兰西转向”与文化研究	(4)
三	国内葛兰西研究状况	(7)
四	本书的主要结构与思路	(11)
第一章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14)
一	葛兰西的文化革命理论	(14)
二	葛兰西的领导权	(30)
三	领导权的维护与争夺	(44)
第二章	葛兰西与英国文化主义	(54)
一	葛兰西在英国的接受	(55)
二	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	(57)
三	文化主义的特征及其困境	(60)
四	雷蒙德·威廉斯的领导权	(65)
第三章	葛兰西与伯明翰学派	(77)
一	研究中心的成立及其理论寻找	(77)
二	研究中心向葛兰西的转向	(79)

2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

三	超越霸权：“福柯效应”与文化政策研究	(90)
四	葛兰西与伯明翰学派的主题研究	(96)
第四章	葛兰西与斯图亚特·霍尔	(131)
一	霍尔的阶级斗争与葛兰西	(132)
二	撒切尔主义与领导权	(145)
三	霍尔的接合理论与领导权	(157)
第五章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173)
一	从索绪尔语言学到话语理论	(174)
二	拉克劳、墨菲的话语理论	(179)
三	拉克劳、墨菲话语理论中的领导权	(189)
第六章	葛兰西与后殖民主义理论	(203)
一	东方学的霸权建构	(203)
二	葛兰西、福柯与东方学	(212)
三	葛兰西与庶民研究	(223)
四	历史细语中的反霸权主体	(231)
第七章	葛兰西与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237)
一	费斯克对领导权的理解	(237)
二	费斯克的偏于反抗与快感的大众文化理论	(239)
三	葛兰西与费斯克批判	(245)
四	费斯克的微观政治与反霸权的可能性	(253)
第八章	葛兰西、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理论	(259)
一	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	(260)
二	其他关于知识分子理论举要	(265)
三	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	(288)

结语 走向后霸权抑或重返葛兰西?	(299)
一 霸权之后与国际政治新秩序	(299)
二 后霸权与新社会运动	(302)
三 后霸权与文化研究	(307)
四 重返葛兰西?	(311)
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7)

绪 论

“葛兰西产业”与文化研究

如果从 1964 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成立算起，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也不足 50 年，但它已然成为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①，在社会科学或人文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甚至被认为已进入了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而许多国家的大学也开设了专门的文化研究课程或相关课程，并授予学位。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陆中国^②，立即对中国人文学科，尤其是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显示出了其巨大的理论生命力。直到目前，文化研究仍然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着重大影响。由此，了解文化研究，了解文化研究的发展史，对我们理解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理解文化研究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而在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是我们所无法绕开的，他就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家和文化学者，

^① 罗钢：《文化研究读本·前言》，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 页。

^② 可参阅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他在政治、历史、文化、文学、语言、教育、哲学等各个方面都对人文及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以至于有学者称其“已成为一个需要去阅读的‘经典’”^①。

一 葛兰西及其理论简述

葛兰西^②出生于意大利撒丁岛的一个小市镇，在岛上度过了20年的时光。1911年，他进入当时处在革命风暴中心的都灵求学，并加入社会党，开始撰写政论文章和戏剧评论。1919年，他与陶里亚蒂等人创办《新秩序》周刊，宣传马列主义。1921年，葛兰西与一批志同道合者退出社会党而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并于1924年担任总书记直到1926年被当时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逮捕。在审讯中，官方检察官要求审判官“必须让这个大脑停止工作20年”。在狱中，葛兰西以惊人的毅力和敏锐的思维写下了32本2000多页的札记，后被整理，以《狱中札记》出版。1937年，葛兰西从监狱获释不久就在医院去世。

葛兰西在学术界以“文化领导权”(hegemony)^③理论著称。他试图关注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文化问题，但又不是把文化和意义问题还原为一个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他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致力于去理解统治集团是如何能通过大众的同意来组织他们的统治的。但这其中充满着斗争、谈判、妥协与让步。这样，统治者

① Kate Crehan, *Gramsci, Culture, and Anthrop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VIII.

② 关于葛兰西的传记性著作很多，可参阅朱佩塞·费奥里的《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约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郝其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隆巴尔多-拉第斯和卡尔朋的《葛兰西的生平》，黄荫兴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毛韵译的《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等。

③ hegemony也可译为“霸权”、“文化霸权”，不过本书主要使用“文化领导权”这一译法。但在强调这一概念的压制一面时，也使用“霸权”的译法，如霸权与反霸权(counter-hegemony)。台湾有的学者翻译为“争霸”，显然是强调这一词语的动态意义。

与被统治者之间就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而是一个动态的相互制约的过程，统治者也会不断受到挑战。围绕着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提出了许多极富创建性的概念或命题，比如“常识”（common sense）、“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阵地战”（war of position），等等。所有这些对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世界人文学界如政治学、语言学、历史学、国际关系、教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出现了像“葛兰西主义”（Gramscianism）^①、“葛兰西式的”（Gramscian）、“新葛兰西式的”（neo-Gramscian）^②等新词汇。也正由此，有学者把由葛兰西所形成的学术场域称之为“葛兰西产业”（Gramsci Industry）^③，足见其影响之广。

对葛兰西的研究始于对其著作的出版（其实早在葛兰西在世之时，就已开始了对他的研究，如陶里亚蒂的文章）。自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葛兰西的著作陆续在意大利和国际上出版，1971年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狱中札记》是比较经典的葛兰西札记的选本。^④而也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葛兰西经由伯明

① 参阅 David Harris, *From Class Struggle to the Politics of Pleasure: The Effects of Gramscianism o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② 参阅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扬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五章。

③ Steven Jones, *Antonio Gramsci*,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21.

④ 1948—1951年，意大利艾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按照以下顺序出版了《狱中札记》：《历史唯物主义与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哲学》（1948）、《知识分子与文化组织》（1949）、《民族复兴运动》（1949）、《论马基雅弗利、政治学和现代国家》（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1950）、《过去与现在》（1951）（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在英语界，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陆续出版了大量的关于葛兰西著作的选本，其中就以昆丁·郝尔（Quintin Hoare）和杰弗里·N. 史密斯（Geoffrey Nowell Smith）1971年编辑翻译的《狱中札记》（*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此书中文译本是曹雷雨等翻译的《狱中札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但有所省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共有约15000种关于葛兰西的出版物出版（http://www.internationalgramscisociety.org/resources/recent_publications/index.html），出版语言种类超过26种（<http://dragon.soc.qc.cuny.edu/gramsci/writings/introself.html>）。

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吸收和改造，在文化研究和人文学界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甚至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the Turn to Gramsci）。^①

二 “葛兰西转向”与文化研究

1976年，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②一文中，就明确使用“葛兰西转向”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大众文化研究中的这一现象。本内特指出，大众文化研究通过转向葛兰西，转向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否定了大众文化领域中的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的简单视野，把大众文化视为一个斗争的场所，一个权力和反权力斗争的动态过程，由此而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为大众文化，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和看问题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发展。他还明确评价了“转向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影响，一是反文化的阶级本质主义，这就使文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认识与理解；二是深化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三是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历史性；四是将差异和矛盾看作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③这可以说是比较明确地阐述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

① 也有学者使用“Gramscian Turn”或“Gramsci’s Turn”，在网上可搜索到，但并不常见。实际上，“the Turn to Gramsci”应译为“转向葛兰西”，即求助于葛兰西来解决自身的问题而非葛兰西自身的转向。但也许“葛兰西转向”在叫法上比较顺口，所以就这样叫了，如罗钢《文化研究读本·前言》，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15页。

② 见 Tony Bennett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xi - xix. 中文译文可见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9—68页。

③ Tony Bennett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 p. xvi. 亦可参见葛莱姆·特纳对此的概述，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 180.

影响了。

1980年,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①中,在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文化研究中的两种范式——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各自的优缺点之后,也清楚地指出了文化研究向葛兰西转向的路线。霍尔指出,文化研究的这两种范式虽然有着各自的活力,对文化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种范式的对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可通约的弱点,又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不能做到最大程度地满足文化研究的需要”^②,“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③,由此也就不能很好地推进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霍尔希望通过寻找到另一种理论来克服这两种范式的对立与不足,以使文化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霍尔最终找到了葛兰西,找到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他说:“在我看来,文化研究的路径已经尝试借助葛兰西确立的一些术语,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进自己的思考,这一路径最接近于满足文化研究领域的需要。”^④由此而形成了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⑤

此外,葛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在《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的《意识形态》一章中,专门阐述了文化研究中“转向

①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最初发表于1980年,后收入多种文化研究读本。本书所采用的原文收录于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Arnold, 1996, pp. 31-48。本文的中文翻译有两个节译的版本,一是陶东风的译文,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4页;二是孟登迎的译文,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51—65页。本文在引用时参照了这两个译文,也对照了英文原文。

② 陶东风译文,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第53页。

③ 孟登迎译文,见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61页。

④ 陶东风译文,见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第53页。

⑤ 罗钢:《文化研究读本·前言》,载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第15页。

葛兰西”现象，分析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是如何整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解决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对立的。^①安德鲁·米纳（Andrew Milner）在《重塑文化研究：文化唯物主义的前景》中也用“转向葛兰西”（Turning to Gramsci）这一词语阐述了英国文化研究后期向葛兰西的转向及其意义。^②通过这些人的阐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中的确存在着“转向葛兰西”这一现象，而“转向”一词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重大影响。不过在更多情况下，很多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明确使用“转向葛兰西”或“葛兰西转向”这样的词语或概念，但几乎没有人会忽视葛兰西在文化研究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中，就以“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之名阐述了葛兰西对文化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斯道雷指出，葛兰西的领导权指的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某个居支配地位的阶级（与其他阶级或阶级的一部分结成了联盟），不仅统治着一个社会而且还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引导着这个社会”^③。这句话可以说准确地点明了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即一方面葛兰西领导权理论是通过同意（道德和精神引导）进行统治；另一方面，这“正在进行中”也指出了作为过程、作为两种力量斗争过程的领导权的特征，这也就是斯道雷所说的，“霸权理论使得我们可以将通俗文化看作是意念与反意念之间‘谈判’所产生的一个混合体；是一种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产生的，既是‘商业化的’

^①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77 - 181. 中文译本参阅唐维敏翻译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4—249 页。

^② Andrew Milner, *Re-imagin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Promis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Sage, 2002, pp. 86 - 90.

^③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第 169 页。